

公孙蜀 著

义和团运动在河北

河北人民出版社

K256.7
24
2

义和团运动在河北

公孙旬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By 05/10/00



B 737381

义和团运动在河北

公孙钊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石家庄市西焦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1/32 7.125印张 176,000字 1990年10月第1版

199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1,500 定价：5.00元

ISBN7-202-00788-6K · 135

序 言

为了纪念义和团运动90周年，公孙司同志继《直系军阀始末》、《冯国璋年谱》等书出版以后，笔耕不辍，又写出了《义和团运动在河北》，这是近年来他结合地方史志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又一丰硕成果。

义和团运动起源于山东，似乎已成为史家定论。但本书不囿于成说。作者根据浩如烟海的地方史志的记载和实地调查了解，认为义和团运动起源于河北省威县。1898年10月3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八日），河北省义和团著名领导人赵三多集合义和拳于蒋家庄祭旗起义，揭开了波澜壮阔的义和团运动的序幕，这比山东朱红灯在1899年9月的平原起义要早差不多一年。赵三多领导的这次起义虽然规模不大，但却震动了清政府的统治，影响十分广泛。据《冠县志》记载：“赵三多为统领，啸聚数千人，蔓延十余县，声势大振，风鹤频惊”。柴萼记载说：“古城、清河、威县、曲周等处之匪渐渐南下，流入（山东）东昌之冠县，自冠县及于东昌各属，自东昌、曹州、济宁、兖州、沂州、济南等处，潜滋暗长，至己亥夏秋之间，其势大炽，然出没于黄河以西，而以直隶为老巢”（《义和团》丛刊第1册，第304页）。充分说明了河北义和团的历史作用。

结合地方史志研究我国近史是本书一大特色。近年来公孙司同志在研究河北省地方史志方面付出了艰辛的劳动，特别是为

了核实有关数据，亲自深入基层查阅档案材料，反复订正，这种严谨求实的学风在科研工作中是应该大力提倡的。他广泛披阅地方史志，不是为了猎奇和标新立异，而是为了更好地说明和解决问题。地方史志中蕴藏着极其丰富的珍贵的历史资料，等待我们去挖掘整理。当然，旧的史志限于撰稿人的立场观点，往往对史实的记载和评论是不公正的，这就需要我们史学工作者依据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作一番去伪存真地功夫，廓清其迷雾，还其本来面目。《义和团运动在河北》一书，在这方面作了很好的尝试。本书引用地方史志数十种，使地方史志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淋漓尽致地揭露传教士在中国的滔天罪行，以饱满的革命热情讴歌义和团的反帝爱国的壮举，是本书的一个显著特点。帝国主义分子以卑鄙的伎俩千方百计地为传教士的罪恶活动进行辩护，而对义和团运动加以种种的诬蔑和诽谤。他们咒骂义和团是“黄种人仇视白种人”，“中国人仇视欧洲的文化和文明”。义和团运动过去50年以后，艾奇逊在他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里还继续诽谤义和团运动是“中国的排外骚动”，是“拳乱”。本书以大量的不可驳辩的史实揭露了一大批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分子充当本国侵略政策的鹰犬，干着残害中国人民的罪恶勾当。他们霸占土地、私设公堂、聚敛财富、包庇教民、包揽词讼、虐杀儿童……正是他们横行霸道、为非作歹，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为了争取生存的权利，不得不起来进行反抗，而绝不是盲目的“排外”。流传于河北的歌谣说“洋毛子，大坏蛋，明着来传教，暗地把人骗”，突出说明广大人民群众对外国传教士有着本质的认识。甚至就连侵略者也不得不承认这些传教士所干的特务勾当：“这些先锋队所搜集的有关民族、语言、地理、历史、商业，以至一般文化情报，将其送回国内，对于美国的贡献是很大的”（美国公使田贝：《美国外交档案》，

1886年，第221页）。此书对传教士种种罪行的揭露，有助于读者深刻了解义和团运动的正义性、进步性，有助于在广阔的背景上了解义和团运动的自发性、广泛的群众性和与帝国主义的树立。义和团运动所以来势迅猛、声势浩大，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义和团的正义性植根于它的广泛的群众性。

本书条分缕析，层次分明。河北义和团经历时间长、蔓延地区广、领袖人物众多、事件错综复杂，在浩如烟海的历史史料中作一番正本正源、扒疏剔罗的工作是十分艰巨的。作者在本书中表现出高超的运用和驾驭史料的能力。全书以时间为纵线、以地区和人物事迹为横纬，说理透彻、脉络清晰。本书不仅在总的背景上深刻阐述运动兴起的原因，涉及到某个局部地区的义和团的由来也作了细致的剖析。特别是对义和团运动爆发地点——威县，作者从地理环境，秘密结社的历史以及民间武术的流行，“团练”与洋教的矛盾等多层次的加以分析说明，从而作出结论：“反清秘密结社，民间武术团体和‘团练’在威县地区的存在都为义和团运动的爆发在人员组织上准备了条件”，对义和团组织的来龙去脉作了清楚的交代。

本书对河北义和团在全国义和团运动中所起到的历史作用作了充分的肯定：1、揭开了全国义和团运动的序幕。2、推动了义和团运动高潮的到来。3、是抗击八国联军的主力。4、后期提出了“扫清灭洋”的战斗纲领，将义和团运动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5、影响和推动了其他地区反帝爱国运动的开展。

河北义和团运动在我国农民战争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规模之大、斗争之激烈、发展之迅猛，都是历史上所罕见的。在运动高潮中形成村村设拳场，家家练拳棒的动人场面。连统治者都不得不惊呼：“拳场林立，指不胜屈”（林秋：《拳祸记》下卷第221页），所以研究河北义和团运动对深入探索我国农民战争的规律有着重要意义。本书书末附有《河北义和团的组织》、《河北

义和团著名首领》、《河北义和团运动大事简记》和《河北义和团运动文献篇目索引》四个附录，有助于史学工作者和广大读者对河北义和团运动的深入了解和进一步研究。

与其他兄弟省区相比较，我们对河北地方史的研究还是很不夠的，衷心地希望我省史学工作者也能象公孙司同志这样，努力于河北地方史的研究，从而出现更多的新的研究成果，为丰富我省广大人民的精神文明生活作出贡献。

韩铁铮

1990年8月

序 言

伟大的义和团运动是一场为捍卫中华民族独立而斗争的革命运动，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因此它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十分注意鼓励史学工作者对义和团运动进行研究，四十年来，在这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然而有不少的文章和著作中，专写河北义和团运动的却不多见。欣闻公孙司同志为纪念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九十周年而撰写的《义和团运动在河北》一书已脱稿，我十分高兴。粗读了这部书稿，已感到相当满足，我认为此书不仅是近代河北地方史专著，而且是当今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

江泽民同志5月3日在首都青年纪念五四运动报告会上说：“在我国历史上，爱国主义从来就是动员和鼓舞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在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抵御外来侵略和推动社会进步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在爱国主义精神的激励下，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自强不息，具有伟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传统，需要广泛深入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这种教育要从少年儿童抓起，全国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年，都要认真学习和了解祖国的历史，尤其是近代以来的历史。”发生在1900年的义和团反帝

爱国运动就是近代史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而河北义和团在整个运动中起了旗手、核心和主力军的作用，因此《义和团运动在河北》一书的出版，对配合当前的爱国主义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帝国主义的侵略，特别是宗教文化的侵略，给河北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西方传教士依仗特权在各地欺压善良，为非作歹，是促使义和团运动发生的重要原因。公孙司同志在此书中运用翔实的资料，以通俗的语言论述了外国传教士在各地所犯下的罪恶行径以及河北人民反抗的斗争，写得简练，但很深刻。这些，对今天的青年人，包括信教群众正确认识什么是宗教以及神甫的作用，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必须与揭露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和热情歌颂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爱国行动相结合，必须与学习革命先烈的救国救民的革命斗争精神相结合，才能达到不忘国辱，振兴中华，才能达到继承革命先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我之所以说《义和团运动在河北》是一本培养爱国主义的好教材，是因为公孙司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叙述、分析和论证河北义和团的地位和作用的过程中完成了这一结合，写出了先烈们当时所能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精神。

公孙司同志为撰写此书不仅翻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而且还多次赴威县、衡水、沧州、廊坊等地进行实地考察，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同时受到了爱国主义的教育。他说：“是义和团先烈们的反帝爱国主义精神鼓励我写这本小册子的。”我同意他的说法，我认为办成一件事必须亲临其境，深入下去，科研也是如此。

总之，《义和团运动在河北》使我加深了对义和团运动的理解，著术脉落清晰，不枝不蔓，因此读起来感到分外亲切，从内心里敬仰义和团英雄们，正是他们置生死于度外，他们手持大

刀、长矛，甚至用自己的身躯去阻止侵略者的攻击，这种视死如归的无畏精神是任何凶恶的敌人也不能征服我们的保证。尽管当时农民阶级的爱国主义对洋人洋事物持偏狭的盲目排斥，但无产阶级早已把历史上的爱国主义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让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吧！

李固安

1990年8月

目 录

一	基督教与传教士东来和进入河北·····	(1)
二	传教士在河北境内为非作歹的罪恶行径·····	(13)
三	河北人民反洋教斗争·····	(32)
四	河北义和团运动的兴起·····	(42)
五	义和团运动在河北各地 ·····	(52)
六	八国联军的入侵及其罪行 ·····	(104)
七	抗击八国联军的英勇斗争 ·····	(117)
八	《辛丑条约》和教案赔款 ·····	(123)
九	反抗教案赔款的武装起义斗争 ·····	(131)
十	河北义和团运动的重大意义 ·····	(138)
附录一：	河北义和团的组织 ·····	(150)
附录二：	河北义和团著名首领 ·····	(157)
附录三：	河北义和团运动大事简记 ·····	(181)
附录四：	河北义和团运动文献篇目索引 ·····	(201)
后记	·····	(211)

一、基督教与传教士东来和进入河北

根据基督教会的传说，基督教是一个叫耶稣基督的人创立的。耶稣于公元一世纪诞生在犹太国耶路撒冷城，《新约圣经》记载耶稣的母亲叫玛利亚，父亲叫约瑟，二人还未同房玛利亚就由圣灵怀孕，生下了耶稣，因此耶稣尊她为圣母。耶稣成人长大继承了犹太教的部分教义，招收十二门徒在巴勒斯坦地区一面传教，一面为穷人治病，赢得了当地人民的拥护和爱戴，但却遇到犹太教当权者的妒忌。约在三十年代当耶稣携同门徒回到耶路撒冷时，门徒犹大以三十元钱将耶稣出卖，最终耶稣以“称王惑众”的罪名，被罗马派驻犹太的总督处以死刑，钉在十字架上。还传说耶稣死后三天复活升天。

基督教所称颂的就是这样的一位人物。他所创立的基督教，不仅为了拯救信徒，而且还要拯救全世界。他本人则是善良的化身，为了洗刷别人身上的罪恶，心甘情愿地被钉在十字架上，为他人赎罪。

耶稣果有其人吗？

多年来，不但在学术界，就是在基督教会内部仍然是一个悬案。根据几百年以来研究的结果，已说明耶稣并非是一个历史人物，他只不过是人们想象中的形象而已。因为在与耶稣同时代

的学术著作中，根本就没有耶稣的名字和事迹，后来各个时代学者笔下的耶稣形象也各式各样。就是教会关于耶稣其人的《新约圣经》也是矛盾百出的，这些连研究基督教的学者也是承认的。

恩格斯在《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一文中根据鲍威尔毕生从事基督教研究的成果说：“连耶稣基督在历史上是否真有其人也成问题。”近代日本著名哲学家幸德秋水在对基督教充分研究后指出：“耶稣基督不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而只是以古代神话的糟粕渣滓，残骸断础拼凑起来而成立的一个没有生命的偶像而已”（幸德秋水：《基督何许人也》，第85页）。既然作为历史人物的耶稣并不存在，那么，耶稣所创立基督教的说法自然也就不成立了。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基督教因此就不存在了。马克思说：“基督教和任何大的革命运动一样，是群众创造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1页）。因此，基督教产生的原因就只有从当时的社会去寻找了。

公元一世纪上半叶，巴勒斯坦一带处在罗马帝国奴隶制的残酷统治下，各地人民陆续开展了各种反抗奴隶主阶级压迫的斗争，尤其是犹太民族对罗马奴隶主专政的斗争最为激烈。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一次又一次的斗争都惨痛地失败了。于是一部分人反抗的意志逐渐消沉下来，再也不想拿起武器战斗了，而是坐等盼望有一位救世主从天而降，以拯救他们出苦海。这就是早期基督教的萌芽，它反映了奴隶和被压迫者对奴隶主阶级的憎恶和对于和平和自由的渴求。因此，这类活动被称为“受压迫者的运动。”而当时耶稣为拯救他人而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传说到处流传，耶稣一时成了人人皆知的名字（基督是一种尊称）于是耶稣基督便成了受苦人民所盼望的“救世主”。随后便从犹太教中分化出了一支以基督名字为宗教名称的宗教，这就是早期的基督教。到公元一世纪末，各种剥削阶级分子钻进基督教中成为专门的神职人员，他们大力进行掩盖阶级矛盾的说教，劝导信徒忍受

苦难，正如基督教文献中所宣扬的“忍受”，“顺从”，“爱那些恨你的人们，这样你就没有敌人了”等等。基督教的这一变化，适应了当时罗马帝国贵族政治的需要，所以逐步对该教采取了保护政策，并于公元392年宣布基督教为罗马国教。从此，基督教变成了历代统治阶级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的精神武器。

十世纪前后，随着罗马帝国的分裂，基督教也一分为二，即欧洲西部诸国仍称基督教，而欧洲中部诸国则改称东方正统教，简称东正教。到了十六世纪基督教又发生了第二次分裂，这次分裂是由基督教神职人员的腐败而引起的。以德国神甫马丁·路德和英国安立甘为代表的改革派主张只信仰耶和華一神，于是此派改称为基督新教，亦称耶稣教或更正教。而意大利、葡萄牙和法国的基督教会仍坚持信仰原基督教所信仰的圣母、圣父和圣子三位一体的天主，故称天主教。

基督教三派是何时东来和传入河北呢？

据有关史书记载，在基督教尚未分裂以前，基督教中的聂斯托里派便从东罗马传入中国。那时为唐代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当时中国人将传入的基督教称为“景教”。皇帝和王公大臣一时对其十分恭敬，有的还成了虔诚的信徒，陕西、四川一带先后建立了“景教”寺院。但到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随着灭佛诏谕的颁发“景教”亦受到波及，从此一蹶不振，不久，绝迹于中原。但在唐势力所不及的西北边疆和蒙古、契丹等居住地区“景教”却依然存在和流行。

公元1271年，元朝建立，基督教第二次传到中国。蒙古人称基督教为“也里可温”教，蒙古语意为“信奉福音之人”。由于元世祖对此教持友善态度，一时基督教又传播开来。这时，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的传教士前后来到中国进行传教活动。1298年（大德二年）意大利方济格会会士若望·德·孟高维诺经元政府同意在大都（今北京）修建了第一座天主教堂，未几，又设立了

第一个教区，并用蒙文译出了《新约圣经》和《旧约圣经·诗篇》。1307年（大德十一年）孟高维诺被罗马教廷任命为中国大主教。当时中国信仰天主教的人约有三万余人，天主教曾一度在河北省河间建筑了一座教堂。民国时，曾从“涿州、琉璃河左近山中发现元顺帝重修的一座古十字寺和寺中十字碑上的西里亚文字”（圣教杂志社编：《天主教传入中国概观》）。陈垣先生在《基督教入华史》一书中也曾指出：“在琉璃河车站旁，有一寺，名曰十字寺，内有好些十字架，还有叙利亚的名字，然不知如何转为佛寺，想当时是一“景教”的礼拜堂也。由此可见，基督教传入河北的时间当以公元十三世纪为准。随着当时罗马教廷的动乱和元王朝的覆灭，依靠元朝贵族庇护的基督教又随之中断。

唐代河北省为河北道，“景教”是否传到此地，尚无资料可查，因此，我们只能说基督教传入河北的时间为元代初年，即十三世纪。

十六世纪时，欧洲殖民主义开始向海外掠夺，欧洲各国传教士也随同殖民主义者的航行来到中国沿海，后到澳门进行活动，著名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便是其中的一员，他1582年从澳门抵达广东肇庆，在此建立了天主教耶稣会的第一座教堂，从此开始吸收教徒进行传教活动。利玛窦由于刻苦学习了汉语和阅读了中国史书，便利了他与地方官的交往，并获得了同情与支持，为其进一步深入内地打下了基础。次年利玛窦赴南昌和南京传教。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他来到北京，向神宗朱翊钧贡献了天主教经典、万国地图、自鸣钟和许多西洋礼品，受到神宗的礼遇，批准他在北京居住。从此，利玛窦一面传教，一面传播西方天文历法等科学知识，为中西文化交流贡献了力量。在利玛窦虔诚精神感召下著名科学家，礼部尚书徐光启、太仆寺少卿李之藻和进士河北吴桥人李天经等先后受洗奉教。在这里，是否可以说河北

省第一个天主教徒应为李天经呢？利玛窦在京期间曾在教徒引导下到徐水安家庄、师家庄、遂城及完县邵家庄等地传教，另一名叫庞迪我的传教士也曾一度到保定传教。利玛窦1627年（天启七年）拥有信徒一万三千人，其中经他亲自付洗的竟有二千五百人（德礼贤：《中国天主教传教史》）。他的成功是他将天主教与中国儒学相结合的结果，他通晓中国文字、语言、熟悉中国人的各种风俗礼节，了解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尤其是他对中国人祭天祀祖极为容纳，并且尊崇孔子学说。他的衣食住行也都实行中国化，再加上他握有尚属先进的天文学、地理学、兵工学、建筑学、伦理学等等，因此，他有了与朝野人士接触的资本。总之，他把天主教与孔孟之道结合在一起，以投中国官、商、士、民之所好。但是，包括利玛窦在内的西方传教士介绍西方科学的目的是进行一场“来征讨这个崇拜偶像的中国”的精神战争（裴化行：《利玛窦司铎和当代中国社会》）。

尽管利玛窦等耶稣教的传教士为其顺利传教和广收教徒，努力将天主教中国化，以此避免在传教过程中引起中国人的反感，但毕竟天主教是从西方世界传入的外国宗教思想，它同中国传统的儒学文化思想及其人民的心理是相抵触的。待等基督教稍微传开，传教士占有立足之地后或者说一旦传教士吸收一定数量的教徒后传教士便本质暴露，开始明目张胆地破坏中国儒学的核心伦理纲常了。从反对异教徒到反对中国人祭神祀祖，因此不断激起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强烈反对，致使明王朝统治阶级日益警惕起来，终于在明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以“变乱历法、暗窃正朔、不祭祖宗、邪说惑众、阴谋造反”等情节，发生了“南京教案”，西方传教士或被驱逐，或送刑部定罪，明王朝颁布了“禁教”谕旨，天主教的传播又一度中断下来。

清朝初年，入关的统治者为了收买人心，出乎意料地废除了明末的“教禁”。于是潜藏在各处的天主教徒又死灰复燃地活动